

资政参考 敬请阅览

视点

第 15 期

镇江市图书馆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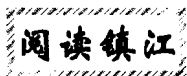
2012年9月15日

ZHEN JIANG LIBRARY

本期 导读

- ☆ 摆正“治官”与“治民”的位置
- ☆ 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亟需改善
- ☆ 积极化解政绩与任期之间的矛盾
- ☆ 一个“走路死”足以让所有繁华坍塌
- ☆ “死都不下基层”该反省的是谁
- ☆ 江苏太仓创新举措破解群众“因病致贫”难题
- ☆ 镇江将迎来近30个文化项目集中展演
- ☆ 民众拒绝的都是“糊里糊涂捐款”

欢迎登录镇江图书馆网站: <http://www.zjlib.net>



镇江名人（九十七）

革命志士——王若谷(1919—1946)，原名致和，又名其明，丹徒姚桥乡王甸村人。小学成绩优秀，保送镇江中学学习，毕业后又考入同济大学。上海沦陷前夕，学校迁至浙江，在浙东遂昌等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民国 27 年(1938)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 1 月，中共浙江省委调王若谷至国民党浙西行署政务处当服务员，为服务员中中共特别支部委员。国民党浙西行署以政务处服务员为基础，成立省政工队第二大队第一中队，王若谷任该中队分队长，开赴临安县进行抗日宣传。是年夏秋，被国民党怀疑，调《浙西民族周报》工作，企图软禁。冬，又调王若谷至天目山朱陀岭集训，王若谷借故辞职。浙西特委调其至吴兴县；从事党的建设工作。民国 29(1940)年春，中共吴兴县委成立，任县委组织部长。1940 年秋；在吴兴塘北织里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逮捕，押至浙东，后脱险回到浙西特委。民国 30 年春，任长兴县委组织部长。是年 10 月任苏南丹阳县委宣传部长，后任镇丹工委书记、镇丹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民国 32 年 3 月，日军在镇江地区“清乡”，王若谷奉命隐蔽于镇江大西路薛家巷口协成南货店，以帐房先生为合法身份，开展城区秘密工作。七八月间，王在店中突被清乡大队以“共党”罪逮捕。经日军多次严审，均未吐露实情。日军见硬的不行，又用软的办法，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计谋，表面释放王若谷，暗中却派人监视。1945 年，日军投降，王若谷立即离开镇江，找到赵文豹，留镇江县工作。北撤时，编入苏中五地委教导队学习，调任江都县任文教科长。民国 35 年 8 月，新四军主力作战略性转移，敌占邵伯镇，县府干部大部分撤至后方，王若谷坚决要求留下坚持。不多日，县武装与敌 25 师在邵伯镇附近发生遭遇战，王若谷突围逃出，隐蔽于绿杨湖畔一风车篷内，被敌发现逮捕。国民党区长凌鸿宝亲自毒打审讯，令其交出枪支，王答以“枪在河里”，痛斥敌人进攻解放区的罪行，惨遭枪杀，复被敌用刺刀捅捣，为党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供稿：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

镇江将迎来近 30 个文化项目集中展演

由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文广集团联合主办的“文化的温度，生活的态度——‘一起周末’2012 镇江文化行动”，近日在镇江召开了新闻发布暨项目推介会。

据悉，该活动将在今年 9 月至明年 1 月期间的每个周末及假日，通过精品话剧、舞剧、展览、音乐会、文化交流活动等近三十个文化项目的集中展示展演，为镇江及长三角城市市民带来一场周末新生活的文化盛宴。

舞台精品将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

“文化的温度，生活的态度——‘一起周末’2012 镇江文化行动”，从生活出发，利用周末、假日休闲时间，放眼长三角市场，整合展览、舞台剧、音乐会和传媒等品质文化资源，嫁接、引入品牌文化活动和产品，吸引更多人群集聚镇江、更多目光关注镇江。

被誉为“北京第一剧”的国家话剧院版话剧《四世同堂》将于 9 月 15 日首次到镇江演出，正式拉开“一起周末——2012 镇江文化行动”的序幕；刘晓庆(微博)领衔的话剧《风华绝代》，带你走过不一样的年华岁月；由中国京剧大师尚长荣主演的新编京剧《廉吏于成龙》值得京剧迷们的期待；悉尼歌剧院演出剧目——大型舞剧《粉墨春秋》将给你带来灵魂的震撼；扬剧表演艺术家姚恭林从艺 50 年专场、原创交响锡剧《天涯歌女》，带您领略身边艺术家和地域文化的魅力；经典歌舞儿童剧《蓝精灵》，让您与孩子共渡美好时光；中国近现代舞蹈专场为您演绎经典舞蹈的永恒瞬间，展示肢体语言的力量。

此外，活动期间还将为观众呈现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芭蕾舞剧《天鹅湖》、中韩合作大型肢体幽默互动数字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等经典舞台剧。

明星闪耀让您的假日生活更精彩

10 月 1 日至 3 日国庆节期间，“2012 长江草莓音乐节”将在世业洲长江鹭岛唱响，拟邀请苏打绿(微博)、卢广仲(微博)、曾轶可、黄义达(微博)、崔健、何韵诗(微博)、王菀之(微博)、黄小琥(微博)等一批人气明星及国内外近百支乐队会聚镇江世业洲，与“乐迷”共同制造、分享专属自我的假日生活。

此外，Super Junior-M 音乐会也将于下半年在世业洲长江鹭岛上炫目开唱，让观众感受最纯正的韩国魅力演出和最时尚、最劲爆的现场；“永远的邓丽君”经典演唱会，将为“君迷”们带来经典的感动与回味；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音乐会、国际钢琴大师布鲁诺·瓦莱尔克钢琴

音乐会、中国锦旗管乐团 2013 镇江新年交响音乐会，让您在镇江便可欣赏到一流国际、国内大师为您奏响的音乐盛宴。

——摘自《新浪网》



摆正“治官”与“治民”的位置

“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治官比治民更难，官治好了，民恐怕也就不难治了——这是必须被重温并重申的政治伦理常识。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梳理舆情时写道：当初唐慧千辛万苦，自己救出女儿，又以死相逼，才使有关方面启动刑事和司法程序。他转引了人民网范正伟的“人民时评”中的论断：“如果执法者能秉公执法、严肃办案，推动人们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就能减少许多不理智甚至以偏执方式寻求说法的行为。”“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难治者非民也，难治者官也！这段话被以不同方式在各大网站突出展示，盖因其指出了一个治国常识。可不少与民众利益冲突的现实案例中，比如收费收税、征地拆迁，人家常见的是地方官治民的“良苦用心”；而诸如治理三公消费、财产公开、渎职追责等方面，常见的又是对官的“无底线善良”，善良得让某些官员自己都不好意思。“严于律民、宽于待官”导致被宽待的官员肆无忌惮。

综观当下，将“治官”摆到比“治民”更靠前的位置，是法治的现实之需，也是善政善治之需。

官与权密不可分，权又与社会各类资源的配置密不可分。权力一旦被官员滥用，社会危害要比无权无势的一般公民的违法后果严重得多，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治国者必先治官然后治民”的说法；现代民主政治更是将治官置于非常关键的位置，甚至将治官与治民的此消彼长，视为评估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标准之一。依法治国首先在于依法治官，绝对不是官员超越法律之外“找法律治老百姓”；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就是要“治官治权”，实现从依法治民向依法治官的转变。

现实中，很多东西之所以混沌不清，根源就在于“治”的主动权掌握在官的手里，缺少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约束机制，有些地方官甚至背离科学发展的路径，用强力、蛮力甚至暴力来解决问

题，制造虚假的稳定。尤其是涉及征地拆迁、治安管制等问题，简单怕事，独断专行，没有耐心在民主协商与法治途径上解决问题，“治民”思维仍然严重且顽固。

治官比治民更难，官治好了，民恐怕也就不难治了——这是必须被重温并重申的政治伦理常识。在“地方管治理民众事务，中央管监督”的制度安排中，要摆正“治官”与“治民”的位置，就该努力做到：

其一，从认识伦理上，形成治官一定要比治民更严苛、更完备的共识，廓清责任与义务的边界，加强治官的制度设计。

其二，从制度上，努力延伸监督、约束地方官员的触角，尽量吸纳民众参与规则制定和监督，实现“民众情绪——中央监督——地方行动”的良性互动。依法行政不仅要让“权力约束权力”，更要让“权利约束权力”，吸纳法律与民意介入，通过细致的约束与严密的设计，实现从严治官。

治官确比治民难，因为官手里有太多抵御被治的资源与手段。当下社会的发展症结，就是努力规范与约束这些权钱资源，避免其裸奔伤人，让其讲规矩、明事理。只要把权力放进笼子里，让官员都能规规矩矩一心为民，民主法治驱走官僚人治，如何治民这等命题恐怕也就迎刃而解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

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亟需改善

持续了半个月的伦敦奥运会落下了帷幕。本届奥运会除了中国和美国的金牌榜首之争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瞩目以外，西方舆论对中国军团在伦敦奥运赛场上的突出表现给予的质疑和偏见也“颇受关注”。

实际上，西方舆论在伦敦奥运会上对中国的偏见折射出了西方对中国包括体育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酸葡萄”心理，同时从侧面也折射出了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仍然很严峻和恶劣，亟需改善。

舆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舆论是国际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领域。国际舆论环境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论，媒体的报道和人民的认知与分析形成对该国的舆论并产生的影响。国际舆论的传播能力和主导能力不但是—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新形势下，国际舆论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关系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实现。

当前，以美国舆论力量为主的西方舆论是当前国际舆论的主导力量，占据国际舆论议程设置主要的话语权，并直接影响着全球舆论环境的变化。西方依靠发达的媒体系统、强大的舆论传播能力以及英语作为世界用语的优势来主导全球舆论，并能迅速将声音传播到全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居于垄断地位，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 80%以上是由 CNN、BBC、ABC、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通讯社提供的。世界上约 60%的消息来源于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他们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只能转载西方舆论。而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来源于美国媒体的也占到约 80%。而备受诟病的是西方舆论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议题的选择性报道以及霸道地将其价值观强加于别人身上。因为有强大的国际舆论控制能力，西方带有偏见的、歪曲的乃至攻击其他国家的论调给别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和破坏性作用。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评价构成中国发展的重要外部舆论环境，也是中国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时一个重要的问题。

随着国际舆论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地位的提升，关于中国的国际舆论呈现多样、多元化趋势，客观、理性的声音增强。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里存在着四种基本的论调：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崩溃论。其中，机遇论和崩溃论始终是比较边缘化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次之。但是，伴随着中国自身国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结构性位置的不断提升，关于中国责任的话题在国内外持续升温。

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随着在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地位相对突出，随着 G2（两国集团）和 Chimerica（中美国）等说法在西方媒体出现，中国责任论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将面临的主导性国际舆论环境，而国际责任问题也极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议题。

虽然，中国为改善自身国家形象，营造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实现的国际舆论环境付出了不懈努力，做出了大量工作，但西方舆论仍对中国肆无忌惮地攻击、曲解、诬蔑、丑化，由于西方掌握着国际舆论话语权，国际舆论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仍面临很恶劣的国际舆论环境。而以西方主导的新媒体使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更加复杂，这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构成了严重挑战。

因此，构建中国的国际舆论传播体系，改善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外交战略面临的重要任务。

——摘自《联合时报》

积极化解政绩与任期之间的矛盾

《南方周末》近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的是川东小城武胜近 12 年间，先后有六任县委书记，平均两年换一个。书记走马灯，城市规划也变得眼花缭乱，一再调整的广场等公共空间逐渐被房产项目挤占。一个典型是 2003 年，时任县委书记孙南组织人手反复论证立下了既能通过商业设施解决资金问题又可供市民娱乐休闲的阶梯广场规划，可惜孙南尚未来得及实施规划便被调走，而继任的书记随即将这一规划置之高阁，并置四大班子的决议于不顾将这片地卖给房地产商。仅仅两年的任期加上县委书记巨大的权力配给，这让地方规划难以长期性、持续性，而出现了短期性、盲目性。主政官员的较短任期和现行政绩评价体系，促使主政官员不得不寻找各种出政绩的机会。

武胜现象并非个案，在不少地方都存在，河北邯郸也是个典型案例。当地民谣称“邯郸一大怪，市长换得快”，据报道，邯郸在 17 年里换了 10 位市长，平均每任市长未当满一年半，更没有一位邯郸市长能够任满一届 5 年。由于主政官员更换频繁，地区发展规划的延续性难免出现问题，各种半拉子工程林林总总，因此，当地不少民众将发展滞后的原因部分归咎于主政官员的频繁调动。无论是在传统还是现行官场逻辑里，毫无疑问皆是官职升得越快越高越好，没有谁喜欢总是呆在一个地方任职。追求早一点升官、升得高一点，是人之常情，也是官之常态，“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不能为了早一点升官、升得高一点而不顾当地实情，不顾当地的长期发展。破除短期任期的短视政绩观，需要智慧，需要勇气，也需要更为科学的政绩评价观。

在政绩与任期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气度不是每一地的官员皆有，更多的官员仍然看重的是任期内政绩。在以 GDP 为考核主要依据的年代，主政官员的政绩主要就是发展经济，且是尽快地发展经济。所谓不发展经济，是为庸官，发展经济快，是为能官。但是快不等于好，快不意味着幸福，政绩出得快并不代表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不代表符合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真正的能官、好官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什么叫又好又快呢？这就对主政官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快是很容易看得见的，好却是较难考评的，因此不少官员选择了快字当头，为了“快”这种能够马上考量的政绩甚至于不惜牺牲“好”。“快”的目的是什么呢？快点升官。然而，你这任升上去了，下一任也要树立新的政绩，再升上去，那么，从哪里来新的政绩呢？一般都不是继承前任规划，而是另起炉灶，创造“耳目一新”。问题在于，每隔一段时间的“耳目一新”，带来的可能是完不成的尴尬，而这种尴尬的苦楚，却只能由当地群众来承担。

“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理念是要不得的。

要想化解政绩与任期之间的矛盾，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一是必须从顶层设计方面建立更加优良的政绩考核体系；二是要推动主政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以长远的眼光来处理政务；三是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对于决策的参与权、建议权，让人民群众的声音能够更多地传递到决策程序中；四是要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避免长官意志主宰一切，避免“一言堂”；五是建立官员责任追究机制，不能一升官就万事大吉；六是尽可能稳固主政官员任职年限，促使各项工作具备连续性，对于完成前任规划的应给予更高政绩评价等等。

改革，不妨从这些看得见的矛盾中着手，一步步予以化解，从而推动改革向前行。

——摘自《南方日报》

“死都不下基层”该反省的是谁

一个农村出身的博士，摇身成为鄙夷贫困地区的“吐槽姐”，抛开道德层面的抒情不说——此般传奇，才是最值得研讨的“社会课题”。

厦大经济学院的一位女博士，近日随校方组织的博士团到闽北山区的原国家级贫困县政和县调研有关生态与经济课题。她在微博上抱怨吃得一点都不好，并称“破地方，过得太憋屈了！每天的饭都是那几个菜……”该女博士在3天的调研结束时发微博：求：1.统战部配个好车送我们；2.航班返回厦门一切顺利！”

很难想象，此类微博竟然出自一位来自湖北农村、在校享受过助学金的女博士。一片诟病声中，当事人终于在微博致歉了，也许这是舆论压力使然，也许这是良心发现使然，但原因都不重要，倒是那些“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的句子，生生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刺向教育，刺向形形色色的调研，刺向某种与基层相关的断裂。

尽管当事人吁求“请大家给我这个不成熟的学生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但真正要反省的不是女博士。

从基础教育到中等教育，从高等教育到精英教育，这么多年的耳濡目染，教会的竟然是对贫困地区的“傲慢与偏见”，起码很难说这样的教育是成功的。不能指望所有的被教育者都能如凤凰涅槃，但如女博士般的抱怨，果真是偶发事件吗？

更值得反思的是所谓各色课题调研。很难想象，在要吃要住、要车要购物的情绪下，“有关生态与经济发 展的课题”能有怎样的进展。这恰恰是一种可悲的悖论：欠发达地区对精英求贤若渴，而高高在上的教科研就号准了脉，将各色“调研”弄成例行的“打秋风”，无助于地方发展不说，反而折损财政效能。这样的调研，和公费出国何异？高校科研有多浮躁，看看各色下基层的课题含金量也可见一斑。

还是当地团委官方微博说得好，“我们理解，生活条件短时间发生巨大差异给当事人带来的困扰，在个人微博上抱怨也算是人之常情，不必上纲上线。但是一个博士生在调研中，没有对欠发达地区民生的关注，只是一味抱怨物质条件，我们很难想象，这将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个农村出身的博士，摇身成为鄙夷贫困地区的“吐槽姐”，抛开道德层面的抒情不说——此般传奇，才是最值得研讨的“社会课题”。

——摘自《新京报》

一个“走路死”足以让所有繁华坍塌

今年4月，北京一女子掉热水坑被烫致死的新闻，曾让举国震惊，让许多人产生了一种不安感甚至恐惧感。人固有一死，我们能想像出一千种死去的方式，但绝想不到会以这种方式：正常行走时，掉入热水坑中被烫死。怕交通事故，我们可以不开车，可以不出远门，但我们都得走路，走着走着就走没了，祸从天降的“走路死”让人毛骨悚然。

也许可以将此解释为意外或极端个案，但可从媒体的盘点中发现，这并非个案，不少城市都发生过这样惨烈的一幕。8月9日至17日，9天时间，哈尔滨城区发生7起坍塌事故，致2死2伤，两车坠坑。大连星海人家丁字路口路面塌陷，一名18岁的学生掉入热力井，导致全身65%烫伤，目前仍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我们的都市，现在都建得富丽堂皇，似乎每个城市都在雄心勃勃地宣称建什么之城、什么之都，赶走小贩和穷人，推倒低矮的民居，到处破旧立新，迷恋摩天大楼，迷恋霓虹闪烁。可是，一个“走路死”暴露的问题，就足以让所有的繁华坍塌，让所有光鲜的形象都蒙上阴影。

专家认为：屡屡发生的悲剧拷问着城市基础设施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市政部门应更加重视人们生命的价值，在规划设计和建设上尽可能周全细致、保证质量，不能把事故原因都归于“意外”。如果始终没有人为“走路死”负责，那么城市质量就难尽快提高——确实如此，发生的好几起“走

路死”事件，尽管报道了，赔偿了，人们震惊了，可热点过后，却没有调查清楚症结出在何处，没有人为此受到处理。非正常死亡的公民，很多就以“意外”的名义白白地逝去了。

一般出了这种事，地方都会急于息事宁人，急于“平息”舆论，没有人为公民“走路死”这种骇人听闻的非正常死亡付出代价，无法阻止悲剧再次发生。于是我们看到，被试过的错一错再错，北京的悲剧，接着在大连上演；大连的悲剧，又在哈尔滨再次发生。“意外”成了常常刺痛公众神经、触痛公众心灵的常见新闻。久而久之，似乎也就成了一种难以根治的社会顽症。

必须让责任人和责任部门付出代价。路面不会无缘无故地坍塌，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不慎”掉进热水坑。如果负责地调查这样的事件，会从事故发生的责任链条中追查至责任人，有市政部门的疏于监管，有基础设施的设计标准太低——甚至建设时就不合标准，有工程存在质量把关不严的问题，豆腐渣工程埋陷阱坑人，还有对工程设施缺乏常态化检查维护。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具体问题上都有具体的部门和人，相应的法律都有规定。不要笼统地将问题推给一个宏观的、不可问责的抽象群体和观念，而应该具体到可问责的个人。

任何一个问题，如果官员群体缺乏共同的利益感觉，如果不在上级视野之内，总难免陷入无解。不动乌纱帽，不让其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官员根本不会对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有任何痛感。

——摘自《中国青年报》



江苏太仓创新举措破解群众“因病致贫”难题

引入“商业保险补充”，建立“大病基金担保”，实施“四个待遇倾斜”……江苏省太仓市近年来创新体制机制，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呈现制度覆盖全员化、保障待遇人性化、经办服务均等化等特征。专家认为，医保“太仓模式”为我国完善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思路。

——“保中有保”提升大病重病保障水平

2011年初，太仓市民王建刚夫妇驾驶摩托车外出途中突发意外，妻子顾莉芬脑部受到撞击，虽然已先后实施三次手术，如今仍然半身瘫痪、神智不清。30多万元的医疗费用中，尽管医保报销比例达63%，可10多万元的自负部分仍让原本就有病儿的家庭雪上加霜。近日，顾莉芬拿到了

一笔近 8 万元的补偿金。“医保中心给我们大病再保险，解决了家里的燃眉之急。”王建刚说。

王家享受到的补偿金来自太仓市推出的医保新政策——大病医疗再保险，这项保险实施范围覆盖所有参保人员。目前，太仓市 47 万本地人和 40 多万外来人员分成了 15 类参保人群，参保率达 99%。从去年 4 月份开始，这个市出台了“大病住院医疗再保险”方案，利用社会医疗保险结余的统筹基金，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 50 元，参加居民医疗保险每人每年 20 元的标准，通过公开招标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对大病住院的人额自负医疗费用进行再次补偿。

太仓市人社局统计显示，去年上半年该市像顾莉芬一样享受“保中有保”的大病患者共有 1156 人，仅“商业保险补充”一项，保障金额就超过 2000 万元。“在确保基金安全运行前提下，用 2000 多万元统筹基金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大病医疗补充保险。也就是老百姓不需要花一分钱，在患大病的时候产生大额的自负医疗费用，可以得到商业保险公司一份比较优厚的补偿。”太仓市医疗保险基金结算中心钱瑛琦认为，“保中有保”在当前医疗保障改革层面上，有效解决了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力度不足的难题，该模式在江苏省乃至全国都属创新。

——“大病担保”既要救病也要救穷救急

沈莹莺家住太仓市浮桥镇牌楼村，2009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她不幸患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沈家父母都是失地农民，打工月收入总共 1000 多元。为给女儿治病，家里的 10 多万元积蓄全部花光。“骨髓移植手术至少要预付 50 万押金。把还没拿到手的拆迁房以 28 万元低价出售，仍有 20 多万的手术费缺口，真是一夜愁白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沈妈妈眼圈泛红。

得知这一情况，太仓市人社局协商后决定先由医保中心作担保，由患者的用人单位为沈莹莺垫付手术押金 30 万元，并通过上级医保部门与医院协商，减少部分手术押金，以滚动结报方式解决了部分就医费用。

同年 11 月，沈莹莺的手术顺利完成。此后，太仓市在总结该事基础上经调研，推出了对大病住院医疗实行“担保”的医保新政策。即医保参保人员患重大疾病需及时抢救或手术治疗，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缴纳医院大额预交金(20 万元以上)的，在医院同意的前提下，由医保基金提供资金担保，减轻病人缴纳预交金过重的医疗负担。

记者采访了解到，提前收取预交金(押金)是医院对住院病人普遍采用的结算方式。根据治疗需要，小病少收、大病多收，但操作中很多大病患者家庭，即使债台高筑、变卖家产仍难以缴纳

高额的预交金。而医疗保险基金又不能将款项预支给病人，导致一些家庭无奈放弃治疗，或者等凑够钱后再住院，延误了病情或最佳治疗时间。

专家认为，由医保基金向医院提供预交金“担保”，既降低了病人入院时的预交金额度，也减少了医院的后顾之忧。预交金担保机制通过医疗费用的滚动结报来支付患者后期的医疗费用，院方不必为此垫支更多的医疗费用，更不会出现坏帐，对救穷、救急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个倾斜”让特需人群享受充分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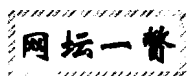
近年来，各地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满足了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但对常年用药的慢性病人、重大疾病患者、容易患病的老年人等少数特殊群体仍显不足。为此，太仓市在确保医保待遇普惠的同时，推出了“向基层倾斜、向老人倾斜、向特殊疾病倾斜、向特殊人群倾斜”的“特惠”措施，尽可能让特需对象享受更多的保障待遇，破解困难人群因大病重病致贫、返贫等问题。

季军峰家住太仓市沙溪镇胜利村，参加的是居民医疗保险，患白血病一年间先后花去医药费近75万元。令人欣慰的是，当地医疗保险先后为其报销了67万元，今年春节前他还获得了2000元左右的医疗救助金。季军峰的父亲告诉记者，他们老两口都在镇上打工，“如果不是医保，家里根本看不起这样的大病。”

记者注意到，在太仓市的医保目录中，老年人装一口假牙也能报销，这在很多地区是难以想象的。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年人牙不好会导致食物难以消化，引发肠胃炎、胃癌等疾病。“为什么不报几千元一口的牙齿钱，非要等生了大病重病再报几万元以上的救命钱呢？类似问题要超前考虑。”

太仓市人社局局长陆俊认为，在建设城乡统筹医疗保障体系的实践中，该市初步形成了具有制度覆盖全员化、保障待遇人性化、经办服务均等化“三化”特征的“太仓模式”。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专家“社保一线行”在太仓考察后认为，这个市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城乡体系建设的成果，为我国部分地区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思路。在医疗保障层面上，已初步破解了“因病致贫”的医改难题。

——摘自《向日葵保险网》



民众拒绝的都是“糊里糊涂捐款”

深圳市绿色基金会近日发起近 20 年来首次大规模义捐活动，称获捐资金将用于城市景观林带建设。让人意外的是，该消息一出，支持者寥寥，网友反对声成片，有网友称“作为纳税人，我已经纳税了”，还直指政府部门绿化建设中的“浪费”和“不透明”，该活动目前未收到捐款。

种种迹象表明，“拒捐”正在成为浮出水面、亟待直面的一种社会情绪。前段时间北京暴雨事件后，虽然社会捐款达到三千多万，但对于政府动员捐款一度也有很强烈的质疑之声，更有媒体断言一场大雨宣告了“中国民间慈善之殇”。无须讳言，“中国式爱心”正走在一个敏感的十字路口，要想继续健康地走下去，必须妥善解决这一困境。

民众质疑多了起来，这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不能简单地以国人精神堕落、丧失掉爱心来作为解释，不然就无法解释国人在汶川地震之后的表现。在一个物质正在极大丰富的社会，大家捐款应该是“不差钱”的，差的是一种认同感情——一个捐款，肯定是清清楚楚的、名正言顺的、磊磊落落的，大家慷慨解囊，不是钱多了没处花，而是因为从感情上认同你，且有一种崇高感，如果出于好心而想捐钱的人，要担心钱财会流入一个贪污腐败的组织手里，要担心自己的举动会被嘲笑“很傻很天真”，你如何让他满怀热情地踊跃掏钱？

哪些事情可以搞募捐，是不是拉一个高尚的名头就可以摆个摊子？当然不是。尤其城市绿化这种本属于政府部门职责范围的事儿，既不属于“一方有难”的特殊情况，也谈不上紧急窘迫，原本就属于很日常的公共服务内容，政府部门(城管局)是否可以联合下属的基金会，公然地搞起募捐呢？纳税人要一个解释，着实合情合理。政府部门回应称，生态景观林带工程等本不缺钱，资金已经到位，“之所以发起募捐，是希望更多的市民参与到绿化建设中”，这样一种解释，似乎很高尚，问题是，领域不紧急、工程不差钱，在还有那么多领域很差钱的当下，这种募捐是不是来得有点没名头？

民众捐的钱能否确保堂堂正正都用在刀刃上，如果爱心人士只负责掏钱，不负责知情花钱之处，大家岂不会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二傻子”？这些年，城市建设工程中借着栽树、搞绿化实现

部门自肥的消息太多了，某些权势方与承包商编织的利益链条也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下想让纳税人“二度掏腰包”，不提供证明管理最优化、监督很靠谱的信息，不公开经费账目明细，如何能够服众，让大家为你搞好花花草草心甘情愿地买单？

所谓拒捐，拒的是一种“糊里糊涂的捐”。以“纳过税了”作为拒绝捐款的理由，本身就是一种叫板与“抬杠”，说透了就是一句话：不信任你，不想给你捐了，找个理由而已。连续发生的事情警示大家：光是简单地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道德说教，已经不足以动员社会爱心的踊跃，指导不了爱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反而会将“道德”搁置于一种非常危险与尴尬的境地。当务之急，是靠规范的制度、较高的公信，来实现募捐文化的升级换代，通过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种种表现，挽留正在犹豫甚至动摇的社会爱心。

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对红十字会的角色定位、内部治理、信息公开、监督机制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和规范。这是一种指导慈善组织、募捐活动走向制度化、文明化的努力，适用的显然不只是红十字会，更是所有与慈善、募捐“沾边”的部门。爱心，是一种情感，更需要高质量的管理实现承载与撬动；在附带着觉醒情绪的“拒捐”面前，少装一点糊里糊涂，多做一点透明公正，工作做到位了，没理由忧虑13亿人的国度里“收不到捐款”。

名校“属地扩招” 伤害教育公平

近日一则新闻将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顶尖学府再次卷入“地域歧视”的雷区：几个月前，清华、北大先后允诺，将在北京地区减少高考招生计划投放。然而，承诺却与现实大相径庭。据媒体报道，清华今年在京总扩招达45.3%，北大今年在京一批次扩招达33.6%。

北京“生源质量好”逻辑“雷人”

对于这样的“逆势而为”的做法，京城两大名校自毁承诺，意欲何为呢？对此，两所名校相继给出了回应，一方面对舆论热炒两校在京城超高的扩招比例，表示极大的委屈，认为这是计算方法的问题。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内与实际录取人数出现偏差，并不奇怪，而来自清华的回应更让人“耳目一新”：考生报考活跃，生源质量较好，所以要在北京扩招。

在消化两校令人费解的回应之前，有一个必须厘清的事实是：北大、清华虽然坐落京城，但它们是中国全国人的高校。按照清华大学的回应，在京录取人数之所以大幅扩招，乃是因为“包括了小语种、降分录取的自主生、文艺特长生、体育特长生、体育高水平运动员等”，如此说来，人数激增倒是可以理解了，但是接下来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些自主生、特长生、运动员等要从北京生源中产生，而不是从各地产生呢？当然，并不排除有其他省份的特长生、运动员也被“宠幸”，但是其他省份显然没有与京城同样的入选机会，当机会不均等了，再令人信服的理由，都是苍白无力的。

清华宣传部负责人的“生源质量好说”，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先看看其“雷人”的逻辑，因为考生报考活跃，生源质量好，所以要扩招。从逻辑上看，确实不存在问题，但实在经不起推敲，请问，在当下优质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全国范围内有多少学子对北大清华不向往呢？无论哪所高校，都希望能招到质量好的生源，有必要追问的是，何谓质量好呢？高分还是高能呢？抑或是好出身好家境呢？在当下高考选拔机制之下，如果认为高素质才是质量好的考核标准，那么又该如何考核？如何判定质量好的就只云集在京城？

不得不说，在中国长期以来总能听到一种刺耳的声音：城市学生素质比农村的高，大城市学生素质比小城市的高，富人家学生素质比穷人家的高。因为他们社交能力好、计算机水平相对较高、有爱好有特长，相信北大清华也是借此判断生源质量标准的。

但果真如此吗？我们看到，贫穷的学生家庭没有财力支撑去学什么特长和购买计算机，更多的家务劳动时间也剥夺了他们社交和扩展，甚至很多落后地区根本就没有特长教学，更没有相关比赛。即便是将不好考察的创新能力作为标准也是一样，什么世面都没见过怎么创新？你又焉知其将来不能创新，创新能力培养不出来？可以说，拿这些东西来作为一个学生质量的体现，这种素质的判断标准本身就是富人的素质标准，对其他地区是种极大的不公。

所以，既然北大清华提起了看生源质量招生，那么不妨把对生源质量的判断标准制定交给别的省份来一起做。否则，会弹钢琴是素质、会用电脑是素质、会打篮球是素质、善于交际有管理能力当过学生干部也是素质。但会种地该不该算作一种素质？能认得五谷知道作物成长规律该不该算作一种素质？会养猪放羊又算不算一种高级素质？清华北大认为，弹钢琴比种庄稼高贵，交往能力比生存能力重要，笔者偏偏认为养鱼比钓鱼更高级，求生比求富更体现素质。这又如何协调？

名校的属地化扩招趋向，无论是就教育公平而言，还是就学生的个人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大

问题。

让各地最优秀的学生都能如愿以偿地上清华，才能使国内最好的教育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属地化的扩招，却有挤兑其他地方学生之嫌，难逃地域歧视！如今，人们对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渐狭窄感到焦虑，在这种情势下，高等教育本应当在促进社会各阶层人员合理流动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清华执意扩招北京考生，无形中剥夺外省市考生进入的机会，有意无意之间，为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推波助澜。

以上信息均来自权威报刊和官方网站

刊头题字：张甫雄 责任编辑：镇江市图书馆期刊部

地址：镇江市解放路 17 号

电话：84447365 邮编：212001

E-mail: zjtsgbk@126.com